

试论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的变化及原因

唐贤清, 汪哲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汉民族在吸收外来词的时候, 创造了各种方式, 并根据时代的变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 对外来词进行吸收与融合, 表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创新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融汇能力。现代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时候, 由于语言、文化、社会的各方面原因, 其吸收方式在各个时期也随之发生变化, 表现在三方面: 从纯音译(早期)到意译; 音译的表意化倾向; 纯音译的回潮与字母词的涌现。这些变化的出现是由现代汉语的特点、文化心理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决定的, 而面对当代外来词的一词多译现象, 可以建立“柔性规范”, 采用“异形并存”和“异格并用”原则来解决。

关键词: 现代汉语; 外来词; 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1-0132-05

一、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的变化

(一) 从纯音译(早期)到意译

晚清至“五四”运动前后, 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为了寻求救国之道, 纷纷向西方国家学习, 大量反映西方新科学、新文化、新思想的语词被吸收进来。近代西方文化科学气候性地大规模东移, 蕴含已久的爆发力给东方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为了赶紧拿来, 当时对外来词主要采用了音译的吸收方式, 即选用同音汉字去标记外来词的语音, 汉字只标示读音, 不表达任何意义。这种方法只是初译时的捷径, 虽然简单易直接, 但许多音译词不能反映出外来词的概念或内涵, 冗长拗口, 易产生歧义, 存在着明显缺陷与不足。如: 斐洛苏菲(philosophy)、希卜梯西(hypothesis)、布理的加门(predicaments)、额悉思定斯(existence)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 意译词以符合于汉民族习惯和特点的要求及表意明白的功能, 逐渐取代了地位很不稳定的早期纯音译词。如:

英文原文	音译	意译
science	塞因斯	科学
telephone	德律风	电话
democracy	德谟克拉西	民主
economy	爱康诺米	经济

dictatorship 狄克维多 独裁

从既不符合汉语双音节习惯又无联想义的音译到意译, 这是外来词被吸收至逐渐融合的一个过程。汉语具有自己的语言规律, 要求进入汉语的外来词必须经过汉化才能被接受, 甚至常用一些外国地名也被汉化了, 如美国加州城市 San Francisco, 音译为“圣弗兰西斯科”, 后改称为“旧金山”。其他有将火奴鲁鲁(Honolulu)改为“檀香山”, 将菲尼克斯(Phoenix)改为“凤凰城”这样富有中国民族风味的名字^[1]。然而, 并非所有的早期音译词都被意译词所取代, 仍然有一些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音译词保持了音译形式, 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如沙发、凡士林、白兰地、咖啡、巧克力等, 它们可以说是源于外来文化, 又逾越了汉人心理屏障及文化堡垒而登堂入室的一部分幸运者, 是为汉文化所容纳与吸收的成员。

(二) 音译的表意化倾向

从语言学的一般原理看, 词的声音和意义之间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一种语言中表示事物名称概念的词音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同时, 彼此间只有声音的相似点, 一般也不存在语音和语义联系的问题。尽管意译更符合汉语习惯, 但音译毕竟是外来词吸收的最基本方式, 尤其是很大部分的外语词无法进行准确完整的意译, 所以为了避免外来词纯表音化

倾向,在不违背音译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选出有某种意义关联的字来构成外来词,使人能按照这些表意性汉字来把握外来词的大致意义,这样不仅顾及译词与原词各音节大体对应,还力求使各字字义按汉语意思组合后,形成一个新的意义和形象,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外来词与本族语的融合程度。这种音义兼备的方式可以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1. 谐音对译

谐音对译是指为音译词寻找意义相当的音近字,根据各意化音节之间的关系分为几种情况:

(1) 聚性关系:各个音节之间的意义结合很紧密,在理性义上给人以明晰概念,在意义上呈现聚性关系。如“俱乐部、芒果、绷带、引得”。

(2) 散性关系:各意化音节在意义上无法凝聚成一个意义,而保持一种散性关系,只能通过相应字眼的暗示,触摸到一点儿形象意义,由此展开联想,估测出该词的大概意义,多表现在商品名称上,如“雪碧、露华浓、的确良、香波”。

(3) 介于聚性关系和散性关系之间:多见于音译加注和半音译半意译类型中表音成分与表意成分的关系。如 motorcycle/摩托车、barge/驳船、ice-cream/冰淇淋、salad oil/色拉油等。

2. 字形意化

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中称为“新谐声字”: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本国的文人想把它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办法硬把他们写作谐声字^[2]。这类外来词利用汉语形声字的特点在音义形上得到最佳组合,见形生义,见形生音,通过字形展示原词的音义。这种字形意化方法古已有之,如“柠檬”(lemon)以前音译为更接近原音的“黎蒙”,改成带来“木”旁的“柠檬”后,在字形上就能想到这是一种植物。与此类似的还有“葡萄”“苜蓿”等。除了用“艹”“木”表示植物外,还有用“犬、马”表示动物,如“狮子、骆驼、猛犸”;用“衣、纟”表示衣服、织物,如“袈裟、雪纺”。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傅兰雅(1839-1928)为了翻译科技名词,曾提出类似的字形意化主张:“设立新名:若华果无此名,必须另设新者,则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其本音,如镁、矽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钻、铎等是也”^[3]。这也就是利用“六书”原理创造专职新字和确定新假借字。于是出现了大量用“金、石、气”等表示化学元素名称的词语,如“锰、砷、氟”等。

(三) 纯音译的回潮与字母词的涌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前所未有地大敞自己的国门,而汉语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口大口吞咽着承载着外来文化的外来词,仿佛来不及仔细推敲其意译形式而直接采用了音译形式甚至是字母词。如 dinks/丁克、mortgage/按揭、clone/克隆、MTV、CEO、WTO、卡拉OK等等。尤其让我们无法漠视的是,在汉语意译词占优势的前提下,一部分原已被取代的音译词重新代替了意译词,如 microphone 最早音译为“麦克风”,后被意译词“扬声器”取代,而现在随着娱乐业的日趋活跃,“麦克风”频频出现于人们口头上、大众媒体中,在网上聊天时甚至被简称为“麦”。此外还有“吐司”“荷尔蒙”“安琪儿”等音译词的重新激活。

二、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变化的原因

外来词首先是语言词汇的一员,它理所当然地是语言的符号;其次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它必然是文化的一种符号;最后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它反映社会的变动和使用它的社会成员的层次类别,所以它又是社会的一种符号。外来词具有语言、文化、社会三种符号身份,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探讨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变化的原因。

(一) 从现代汉语的特点来看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当一种语言的词进入另一种语言时,主方语言必然会对客方语言的词进行驯化,使之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符合或尽可能符合主方语言的结构规律和发展变化规律,直至最后成为主方语言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外来词的吸收方式从纯音译到意译的出现以及音译的表意化都说明了上述规律作用的发挥。布龙菲尔德也曾说过:“历史学家将要把这种现象算作一种适应,这种适应可以改变外国的语词来迁就自己语言的基本语言习惯。”汉语具有如双音节词占优势,有声调,汉字表意性强等特点,如果外来词进入汉语时不符合这些汉语言规律,中国人就会采取一种自然的排斥拒绝的态度,尤其是一些地位很不稳定的音译词,如早期的纯音译词,如果不经汉改是很难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从上面音译词到意译词的变化可知这种改造可分为:

1. 双音节化

早期的意译词一般双或多音节的,变为意译词后音节一般都相应缩为双音节的。例如 *proletariat* 曾全音译为“普罗列塔利亚”,这样长的音节组合一般民众无法接受,于是很快代之以音节简化后的“普罗”。

2. 表意化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每字一音,且字字表意,令人可以望形生意,而这就是意译词最本质的优势,易于被理解接受。例如“电话”一词,即使是从未见过实物的人也能猜出这是一种与电和通讯有关的东西。

外来词的吸收方式走向在历史和现实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一致性:音译往往在初期发达,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当部分的音译词被意译词所取代。汉语的翻译史表明,我国大批吸收外来音译词,始自佛教的传入,然而从梵文来源的外来词看,在794个音译词中,现在只有“梵、佛、菩萨、弥勒、刹、塔”等50多个词还在使用,仅仅占原引进词的16分之一。其他梵文来源的词或者基本上改用意译形式或者仅留存于佛经和僧尼社群中,对于全社会和语言系统已经基本不起作用^[4]。即使在现存的音译词中,也有不少经过双音节的改造,如“菩萨”是从原音译形式“菩提萨埵”分段简缩(菩提/萨埵)而成的。而以意义形式产生的佛教词语,如“有情、世界、法宝、真理”等词,其中一部分产生了引申义,成了汉语里的通用词。

通过比较香港方言和普通话的外来词,也可以发现从音译到意译的变化痕迹。香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英语对香港方言的渗透和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香港方言采用的外来词绝大部分是音译的,在普通话里,这些音译词曾经使用过,但现在已变成了意译词,如“派对——聚会”“摩登——时髦”“开麦拉——摄影机”“菲林——胶卷”^[5]。

即使是无法意译的外语词在被吸收为外来词时,尽量使其意义上带有汉化倾向,使其适合汉语的特点,尽量淡化其外来特色。众所周知,汉字的构造方式中形声字居多,兼顾表意与表音,于是当汉语吸收音译外来词时选择音义融合于一体的形声字,令人从形旁中得到该词义的启示。最典型的例子是英语 *pound*,它既可作重量单位,也可作货币单位,汉语在吸收时则用“石”旁的“磅”作重量单位,用“车”旁的“镑”作货币单位,这样使在外语原词中完全表音的一词双义在汉语中通过形声字的意化作用得到了明确清晰的分辨与诠释。

此外,音译加注类型和半音译半意译类型的词

都是在表意化方面大做文章来迎合汉语,以获得汉语内部规律的首肯,成为汉语大家庭的一员^[6]。如“达姆弹”源于英语 *du mdu m*,词音译为“达姆达姆”,后双音节化为“达姆”,但无法从表面上断其意义,于是又增加了义标“弹”以符合汉语求类的习惯,成为“达姆弹”。

(二) 从文化心理来看

1. 传统文化心理

外来词的存在和发展是语言融合的一种初级形式,它又是文化融合的一种初级形态。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同样在有意无意地按汉民族心理和习惯改造外来词,使之成为符合自己规范的外来词。就其历史文化心理原因来讲,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从而使汉民族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孤芳自赏式的自豪感与满足感,不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加上对土地的依赖和古老遗风余俗的长期保存、积累,使中国人在心理上具有一种排斥外来事物的封闭性,对与汉语规律格格不入的纯音译词采取本能的排斥态度,就好像美国著名华裔比较文学家许粮先在其《比较文明社会论》中说道:“就对语言关系而论,众所周知,中国人最抵触的是音译。他们有某种一致的倾向,即喜欢在祖语中去寻找适应新的需要的词汇和词根。”中国历史上一直崇尚儒学,儒学所提倡的为人之根本是“中庸”,它渗透进中国人的骨髓,演化成一种崇尚四平八稳模式的生活理想。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中庸思想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陌生的奇异东西首先采取一种排除拒绝的态度,并且他们在阅读审视语词时,心理上形成了一个建立在汉语规律上的“完形”,只有符合这种完形的词语才能使汉人的心理电力场维持平衡,形成一定审美意趣^[1]。这便是音译外来词为什么会多多少少在汉语中处于劣势的原因。

但是事物总有其复杂性。中国人心理上一方面有排斥外物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又有吸收消化外物以丰富发展自己的宽容性和灵活性。儒学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求同”,“通而同之”、“求大同存小异”。中国人习惯用自己原有的一套来理解、解释、融合外来的异己事物,从中模糊对方本来面目将之同化^[6]。当人们无法用意译方式吸收外来词时,就会在音译时尽量使之表意化。谐音对译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 语言拜物与禁忌

这是汉民族求安、向善、祈福的心理在实物名称

音译上的体现。如用“宁、灵、福、安、泰、利”记录外来词中医药名称,如 *cloidine*/ 可乐宁(降压药)、*mil-ton*/ 眠尔通(安定药)、*reserpine*/ 利血平(抗高血压药)。再有用“毒、杀、灭、敌”记录外来词中毒药名称,如 *DDVP*/ 敌敌畏、*diptere*/ 敌百虫^[9]。就连一年一度的美国 TOEFL 考试也被译为“托福”而含有祈求吉祥幸福的意味。

(2) 形象联想

中国人善于形象联想,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很强的审美意味。如“雪碧”使人产生一饮即凉的感觉,“香波”飘荡着一种香气袭人的可感形象和诱人味道,其他如 *daeron*/ 的确良、*Coca - Cola*/ 可口可乐、*miniskirt*/ 迷你裙、*Bans*/ 奔驰、*break - dancing*/ 霹雳舞等词都能让人浮想联翩,在脑海中形成带上感情色彩的实物形象。语言拜物与形象联想使外来词具备了汉族人所认同的文化亲切感,相对于早期纯音译词,这种音译词更容易被人认可接受。

2. 开放的心态与求新心理

这是纯音译的回潮与字母词的涌现也有其重要的文化心理原因。由于纯音译外来词在使用汉字音译时一般遵循的是散性原则,不让各个汉字之间发生字义上的聚性联系,因此不能通过字面来了解其含义,于是使人感觉有点模糊、深奥。这样就在使用上获得一种特殊的心理效果,让人感到高深、神秘、新鲜,或者非同一般。如“洋金花”与“曼陀罗”分别是同一种植物的意译形式与音译形式,但风格迥异^[10]。追求新奇刺激是人们心理的共性。如今经历了二十多年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人,已非昔日封闭时所能比,生活的丰富,思想的活跃,社会氛围的宽松,多元化的选择,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热情,强化了人们对个性化生活追求,尤其是年轻一代本没有丰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中国既有的文化观念、思维习惯一时还无法让他们形成稳固的心理定势,他们的心理还处于一种活泼多变的状态之中,表现在语言运用上,便是追求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风格,陌生化的表达效果,突出表现在纯音译词与字母词的大量运用。随着国民文化心理的日趋开放,国人一方面承认与欧美比较的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民族自信心大增,敢于以正常心态去直面异质文化,努力学习并奋力赶超,于是国人更趋向于接受纯音译词和字母词,以便能直接接触外来文化,尤其是字母词的涌现可以说是国人接纳异质文化之开放心态的表现。

(三) 从社会进步的影响来看

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异文化输入浪潮都伴随着大

量音译外来词的借入,如早期的纯音译和现在的纯音译的回潮,是因为音译作为吸收外来词方式之一是最迅速最简便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引入早期,由于我国处在经济相对不发达时期,缺乏甚至没有相对应的参照实物,更无对应词,所以中国人当初引进外来概念时,只能简单模拟语音,用汉字转写。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许多新词能在汉语中找到对等物或基本对应的词语,而过去使用的一些音译词,人们在逐渐了解其确切含义后,也通过意译词来取而代之,人们往往可以通过字面意义就能推测或判断其基本含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国的外语教育水平使得广大人民对纯音译外来词的接受能力很差,纯音译外来词难以被吸收消化。但是,随着外语教育的普及,纯音译词也越来越容易被人们接受,甚至使用纯音译词和字母词已成了受教育水平高的一种表现。

汉民族在语言运用上主张“言贵于省文”、“文约而事丰”的简约之美。在现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交换的频繁对词语的运用提出了简省的要求,于是大量使用字母词。字母词一般是包含较大信息量的缩略词,原词多是一个词组,成分多,词形长,称说不便。如 DVD 的全称是 *digital video disk or versatik disk*,中文为数学视盘;WTO 的全称是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使用字母词显然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缩略语的简捷灵活的优点得到了广泛利用。字母词多见于科技文章里,如“采用 MMX(tm) 技术之 Thtel 奔腾处理器,200 MHz 32 MB EDO 记忆体,4.3 GB 硬盘,MPEG 解码软件”,科技文献的国际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总之,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词时,由于语言、文化、社会的各方面原因,其吸收方式在各个时期也随之发生变化。评判哪种吸收方式引进的外来词更有生命力,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人们的接受程度与使用频率,实用、经济的吸收方式才是人们的首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上述一种或几种吸收方式的优势总会格外突显,用其引进的外来词会更快更好地为人们所接受。

三、由吸收方式的多样化引起的一词多译现象及其规范化

汉民族在吸收外来词时采取和创造了各种方式,并根据时代变迁不断进行调整与优化,对外来词

进行主动选择、吸收、融合,不断丰富汉语的容量与表现力,以满足当前交际需要,表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创新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融汇能力。但一个外来词由于使用多种吸收方式而出现了几种不同语言形式,产生了一词多译现象,使得语言形式冗余。关于这个问题,五十年代高名凯、刘正琰就曾提出了二并原则:

(一) “异形并存”原则

同一外语词因语义分化而造成的词形不同的外来词,如 motor 曾译为“马达”“摩托”两个形式,同指发动机,而现在“马达”指电动机,“摩托”指内燃机,后逐渐成为摩托车的简称,二者由于分指不同事物而双双得以保留。

(二) “异格并用”原则

语言词汇除了表明概念之外,还有表达风格的差异。这是同义词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词所表达的概念可以是相同的,但从风格的角度来看,词所表达的风格可以不同。从音译到意译再到音译的回潮,形成了不少异形词,如天使与安琪儿,电子邮件与伊妹儿,出租车与的士、瘵病与歇斯底里等。这种异形词不能被简单视作语言的累赘,它们反映了某种文化差异和语体色彩,往往因使用者所属群体、使用的对象、场合以及期望达到的效果的不同而决定采取何种形式。意译词常用于科技文体和正式场合,而音译词因具有异国情调,与使用者希望营造的意境、气氛更为相适,有时则因意译词所无法替代而并行不悖。如“的士”就因简洁多用于口语,“出租汽车”书卷色彩浓,多用于正式场合,一

般说“xx 出租汽车公司”而不说“xx 的士公司”。再如“镭射”与“激光”,“镭射”多用于商业娱乐领域,如“镭射电影”“镭射影碟”,而“激光”多用于科技、医药领域,如“激光打印”“激光手术”^[8]。

面对当代外来词的一词多译现象,我们应该把词汇系统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采取宽容态度,给外来词一个发展生存空间,允许几种方式、几种变体并存,即史有为所说的“柔性规范”,承认规范问题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承认影响规范的是多个因素,并在此认识上建立多因素参与的规范模式,按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方案和力度去指导现实的规范工作^[4]。因为语言使用的多元化决定了为社会服务的语言形式的多元化,只有在兼容并包的同时不断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才能保持汉语词汇系统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胡晓清. 外来语[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 [2]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9.
- [3] 史有为. 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 [4] 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5] 邵敬敏. 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00, (3): 3-12.
- [6] 柳星. 外来词汉化的文化心理原因[J].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0, (5): 11-13.
- [7] 王珏. 汉文化对外来词的驯化[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4, 67(2): 70-76.
- [8] 姜明磊. 汉语外来词多译并存问题初探[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3(1): 45-49.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how and why the way of taking in loa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changes

TANG Xian-ling, WANG Zhe

(Chinese Depart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ll kinds of ways that Chinese have created to take in a great number of loan words. They have been perfecting these ways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times in order to choose, take in and accept loan words better. It shows great capacity and creativity of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the ability of accepting foreign culture. For the reason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way of taking in loa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changes with the time, that is, from complete transliteration (in early stage) to free translation, the trend of being ideographic in transliteration, the resurgence of complete translit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letter words in large numbers. In order to make a deep research of the reason why it changes,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the related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multi-translations of loa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we should set up flexible standard and adopt the principle which permits different forms and styles to coexist and to be used.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oan words; language contact

[编辑:汪晓]